

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

唐 荣,顾乃华,谭周令

(暨南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推进了产业升级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中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借鉴 Antras 等提出的最新方法,结合微观企业数据库,从价值链上下游视角对企业价值链定位现象进行测算,考察了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行业层面,产业政策应重视市场竞争,选择市场竞争度高的行业作为目标产业能显著推动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在行业内,产业政策应强调提升市场竞争度,一方面坚持普惠性原则,针对整个行业而不是单个企业或部分企业的产业政策,能有效兼容市场选择机制和激发企业价值链升级;另一方面重视“年轻企业”的发展,针对市场竞争程度高、创新动力强的“年轻企业”实施的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激发效应更大。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企业价值链定位;实施路径;年轻企业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9)01-0012-15

DOI:10.13269/j.cnki.ier.2019.01.002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及国际地位的持续上升,本地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的频率不断增加,中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中的作用也愈发重要^[1]。而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间存在大量的贸易差额,致使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2]。特别是在2018年的贸易摩擦中,美国更是瞄准了我国的高端制造业,锋芒直指“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规划,尤其针对中国微型芯片、电动汽车等知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美国制裁中兴通讯亦成为标志性事件^[3]。正是由于缺乏品牌与核心技术,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始终被美国企业扼住咽喉,此次事件正是警醒中国急需加快推动技术进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世界加工厂”的在位优势,加速实现了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下的经济起飞与工业化,但受制于发达国家的“俘获”“纵向压榨”与“技术封锁”的事实却并未改变,东部地区代工企业长期陷入低端锁定与“微利化”境地,难以实现企业功能升级或链条式升级^[4]。

纵观产业发展实践,跃居价值链高端的先发经济体及陆续实现经济赶超、获得价值链攀升的后发经济体,都是由于转向国内市场培育并构建本土企业主导的价值链生产网络^[5],从而表现出更强的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的能力^[6]。如日本政府在1986年将经济发展模式由寄生型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向以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开发为主的“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循环模式转变,为日本日后经济强国

收稿日期:2018-11-13;修回日期:2018-12-15

作者简介:唐荣(1991—),女,湖南常德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发展与产业政策;顾乃华(1977—),男,江苏响水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服务经济与管理;谭周令(1990—),男,重庆城口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结构与产业演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4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873040)

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而美国联邦政府更是将消除市场分割、构建统一市场纳入美国宪法，确立了美国国内统一市场的制度性框架，对美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8]。因此，无论是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还是当前中美贸易战局势来看，构建注重国内市场培育的国内价值链，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对中国产业升级与企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性越发突出^[9-11]。因此，面对我国本土企业价值链低端嵌入与结构封锁的双重困境，以及国内市场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国际市场“逆全球化”和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 TPP 等标志性贸易保护主义事件的发生，中国政府积极采取一系列诸如“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释放国内发展活力与潜力的政策措施，以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促进国内产业整合与区域协调发展。那么，在上述国内国外经济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针对产业整合与发展的政策实施究竟会对本土企业价值链攀升产生怎样的客观影响？尤其在我国市场机制仍不完善的前提下，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基础薄弱、市场发育滞后、企业对产业政策既有期待也有依赖等客观现实存在，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达到既激发企业价值链升级动力同时又避免资源错配的负面效应？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然而，以往有关国内价值链的研究多侧重于 NVC 概念的界定及运作原理和机制的提出等定性分析层面^[12-13]，缺乏在准确测度国内价值链水平基础上的定量分析。张少军^[14]、张少军和刘志彪^[15]采用垂直专业化指数法测度国内价值链，并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实证考察了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之间的关联对接问题。然而上述研究均缺乏相对系统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为弥补该缺陷，黎峰^[16]提出国内价值链发育度及匹配度概念，并基于跨区域投入产出表提出增加值分解法测算国内价值链。已有研究虽为本文的展开提供了深刻洞见，但仍有如下不足：（1）研究对象。已有研究主要从地区或产业等宏观层面考察国内价值链的动态演进，并未针对国家价值链分工主体——企业，构建相对系统的分析方法。（2）数据缺陷。以往定量分析都只是根据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年份以截面数据为主，缺少时间维度上的对比分析。（3）研究视角。已有研究未曾考察如何构建与提升国内价值链问题，尤其从政策与市场结构等宏观层面系统探讨提升企业价值链的具体措施。根据 Aghion *et al.*^[17]的观察，一个能促进企业间良性竞争的产业政策体系在激发企业技术升级，进而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上述思路，本研究拟采用高度细化的外贸产品海关数据库和制造业企业生产数据库，在综合考虑市场与政府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互补性关系后，探索促进中国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最优产业政策施政选择途径。

相较于既有文献，本研究的贡献主要包括：（1）基于微观主体的研究。本研究拟基于海关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匹配得到的样本，在测算企业层面产业政策、市场结构及国内价值链定位指标基础上进行后续实证研究，得出更为科学合理的研究结论。（2）企业价值链定位测度。本研究在借鉴 Antras *et al.*^[18]及 Fally^[19]的“上游度测算”思路的基础上，结合海关数据库中提供的 HS 八位产品编码出口值信息测算出各企业的价值链定位情况。（3）研究视角的创新。政府与市场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是推动我国产业价值链动态演进的重要力量，尤其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综合考虑市场与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互补性力量至关重要。

二、产业政策与市场结构影响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 Aghion *et al.*^[17]给出的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的理论框架，在保留代表性模型核心思想的同时进行适当调整，推导出产业政策与市场结构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动态关系与条件。具体调整体现在：（1）模型中增加了制度环境的影响。原模型忽略了影响创新成果维持成本的制度环境的影响，这不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情。中国作为“新兴加转轨”经济体，市场制度不健全已成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常态^[20]，制度环境缺陷将直接增加市场侵权现象，提高企业创新维权成本。因此，在模型中考察制度环境的影响似乎更合理。（2）调整了企业共谋概率的表达形式。本文将企

业间共谋概率作为产业政策与制度环境的函数形式引入模型,更为直观地反映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3) 将政策变量 s 纳入模型。本文综合考虑补贴、税收优惠及低息贷款三项政府干预政策,通过刻画政策与企业成本、政策与企业间共谋概率的关系,直接在成本函数与共谋概率函数中体现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行为的影响。修正后的模型构建过程如下:

(一) 基本假设

1. 消费者行为

考虑一个两部门经济(A和B),供应以不同技术生产的A、B两种产品,两种产品的消费量分别为 x^A 、 x^B ,那么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U(x^A, x^B) = \log(x^A) + \log(x^B) \quad (1)$$

消费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另外,为简化计算,假定消费者收入为2,如果产品 i 的价格为 p^i ,那么满足效用最大化的需求量为 $x^i = 1/p^i$ 。

2. 生产者行为

经济体中存在两家大型企业(F1和F2)和部分边缘企业,边缘企业具有一定竞争力且拥有不变边际成本 c_f 。由于我国政策实施更加倾向于大型国有企业,因此我们假设政策实施只是针对具有升级能力的领先企业,且政策扶持能直接降低企业成本,因此大型企业面临的实际成本为:

$$c = c_l(1 - s) \quad (2)$$

其中, c_l 为大型企业的常边际成本, s 为政策扶持度,且存在 $c_l < c_f < 1$ 和 $0 \leq s \leq 1$,表明大型企业具有成本优势。

3. 市场竞争

假设部门间进行 Bertrand 竞争。如果两家领先企业选择进入不同部门生产,则被称为多样化生产模式;如果两家领先企业选择进入同一部门生产,则被称为集中化生产模式。另外,在集中化生产模式下两家领先企业可以选择是否进行串谋,如果串谋失败,则进行 Bertrand 竞争。进一步假设两家企业采取串谋行为的概率为 φ , φ 越大表明市场竞争程度越小。因此,可将 φ 作为市场竞争程度的反向衡量指标。在政策扶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政策扶持强度越大,受扶持企业进行串谋以延缓其他企业发展壮大的动机越强。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监管者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将会减少占优大型企业的串谋行为^[21]。可见良好的制度环境(θ)将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能有效降低企业间共谋概率。因此本文进一步假设:

$$\varphi = \frac{a \times s + b}{\theta} \quad (3)$$

4. 企业价值链升级行为

为简化模型,我们假设只有两家大型企业可以选择是否进行价值链升级,且价值链升级能直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但在部门A、B间成本降低的幅度存在差异。其中,部门A与部门B的成本降低幅度分别为:

$$\frac{c}{\gamma_A} = \frac{c}{(\gamma + \delta)} \quad \frac{c}{\gamma_B} = \frac{c}{(\gamma - \delta)} \quad (4)$$

γ_i 表示部门 i 的产业升级潜力,很显然 $\gamma_A > \gamma_B > 1$,这表明部门A为高科技产业,对部门A进行研发投入能更快降低成本。两家企业具有相同概率获得转型升级思维,被选为潜在升级者且升级成功的概率为 q 。结合现实,企业升级需要承担一定成本,除了用于升级的研发投入($\frac{q^2}{2}$),由于我国制度环境缺陷,企业维持研发成果的成本也不低^①。进一步假定企业研发成果维持成本与企业研发支出成本之间的比例为 θ ,那么企业价值链升级行为需要承担的总成本为

$\frac{\left(1 + \frac{1}{\theta}\right)q^2}{2}$ 。

(二) 均衡利润与价值链升级强度

1. 多样化生产

在多样化生产情形下,每个部门都由一个领先企业与部分边缘企业组成,企业间进行 Bertrand 竞争。如果大企业在投入生产过程中未获得价值链升级思想(概率为 50%),由于具备成本优势,大企业必然将最终价格调至略低于 c_f 的水平,从而得到整个市场,因此利润为:

$$\pi^{DN} = \frac{c_f - c}{c_f} \quad (5)$$

若企业获得升级思想,它便将采取实际行动进行研发投入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pi_i^{DY} = \max_q q \left(c_f - \frac{c}{\gamma_i} \right) \frac{1}{c_f} + (1 - q) (c_f - c) \frac{1}{c_f} - \frac{q^2}{2} \left(1 + \frac{1}{\theta} \right) \quad (6)$$

求解式(5)的最优化问题可得,多样化生产情形下最优升级概率和潜在升级者的期望利润为:

$$q_i^D = \frac{\gamma_i - 1}{\gamma_i} \frac{c}{c_f} \frac{1}{1 + \frac{1}{\theta}} \quad (7)$$

$$\pi_i^{DY} = \frac{(q_i^D)^2}{2} \left(1 + \frac{1}{\theta} \right) + \frac{c_f - c}{c_f} \quad (8)$$

由于整个部门 i 中包括升级和不升级两类企业,因此,多样化生产情形下部门整体期望利润如式(9),可知部门 A 的期望利润更高,两家领先企业进入 A 部门的意愿更强。

$$\pi_i^D = \frac{1}{2} (\pi_i^{DY} + \pi^{DN}) = \frac{1}{4} (q_i^D)^2 \left(1 + \frac{1}{\theta} \right) + \frac{c_f - c}{c_f} \quad (9)$$

2. 集中化生产

在集中化生产模式下,具备较高增长潜力的部门 A 是最优选择,此时部门 A 由两家领先企业和部分边缘企业组成,而部门 B 完全由边缘企业组成。且部门 A 的均衡价格为 c ,而部门 B 的均衡价格为 c_f 。若企业未获得升级思想,企业预期利润为:

$$\pi^{FN} = \frac{\varphi}{2} \frac{c_f - c}{c_f} \quad (10)$$

若企业获得升级思想,并采取实际行动进行研发投入,一旦企业升级成功便不会选择串谋行为。因此,潜在升级企业的期望利润为:

$$\pi^{FY} = \max_q q \frac{\gamma + \delta - 1}{\gamma + \delta} + (1 - q) \frac{\varphi}{2} \frac{c_f - c}{c_f} - \frac{q^2}{2} \left(1 + \frac{1}{\theta} \right) \quad (11)$$

求解最优化问题并结合式(2)与式(3)可得:

$$q^F = \left[\frac{\gamma + \delta - 1}{\gamma + \delta} - \frac{a \times s + b}{2\theta} \times \frac{c_f - c(1 - s)}{c_f} \right] \times \frac{1}{1 + \frac{1}{\theta}} \quad (12)$$

根据式(12)可知,企业价值链升级成功概率将伴随自身升级潜力(γ_i)的提高而增大。由于政策扶持只针对具有价值链升级能力的领先企业,因此,政府扶持强度的增加一方面虽然降低了受扶持企业的经营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企业间共谋概率(φ),从而削弱市场竞争度,抑制企业价值链升级行为。当企业间共谋概率(φ)降低时,企业的价值链升级程度(q)也会增加,可知企业价值链升级与市场竞争呈正相关关系。另外,良好的制度环境将通过降低企业间共谋概率,激发企业研发投入,从而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因此,政府若想有效激发企业升级行为,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应在政策扶持总额不变的情况下,通过降低针对领先企业的扶持额度,允许更多边缘企业获得政府扶持,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度,激发企业升级研发投入;另一方面,政府应致力于改善制度环境,为企业发展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竞争的增强与良好的制度环境将有效激发企业价值链升级行为。

假说 2: 针对领先企业的产业政策将抑制企业价值链升级,而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实施有助于降低其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抑制效应,并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激发企业价值链升级行为。

三、企业价值链定位核算

(一) 企业价值链定位核算方法及其适用性分析

根据波特提出的价值链理论逻辑,每个企业都处在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即企业价值链包含在更大的产业价值链活动群中。产业价值链的每个价值创造环节都是由大量同类企业的产品生产活动组成的,因此,各行业价值链定位可用来近似衡量行业内各企业所生产产品的价值链定位,进而分析各企业在价值链中所在的位置。本文借鉴 Los *et al.* [22] 有关国际碎片化价值链的程式化表达方式进一步表征产业价值链分工的链条式关系,进而体现产业价值链定位与产品定位的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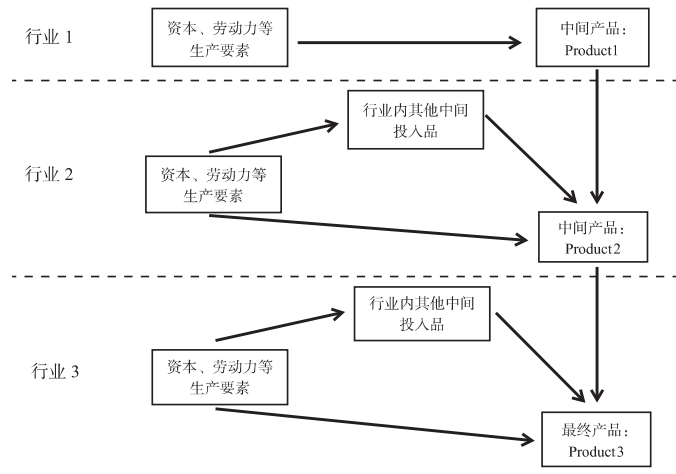


图 1 产业价值链分工的链条式关系

根据图 1 显示的产业价值链分工程序可知,这是由三个行业组成的简化的产业经济链,产品的最终生产阶段发生在行业 3,我们称之为完工行业。根据这一行业价值链分工链条可清晰看到各行业距离最终消费的长度。另外根据波特的逻辑,产业链的价值创造活动是由产业链中各企业的产品生产活动组合而成的,因此,各行业距离最终消费的长度也可用来近似衡量行业内各企业所生产产品距离最终消费的长度。也就是说,我们可根据行业价值链定位映射到企业产品层面的价值链定位,以分析各企业在价值链中所在的位置。

因此本研究拟借鉴 Fally [19] 和 Antras *et al.* [18] 的“上游度测算”思路,将测算出的行业价值链定位匹配到企业层面各产品的价值链定位,进而得到各企业价值链定位指标。具体做法为:根据 Antras *et al.* [18] 提出的测度方法得出各行业在价值链上的具体位置,再结合海关数据库报告中的 8 位 HS 编码产品的月度出口值信息,将海关月度数据按照企业编码与产品编码汇总成年度数据,并基于《海关统计商品分类与投入产出部门分类对照表》,将行业上游度匹配到海关数据库中每个企业的产品类别下,然后以每种产品出口比重作为权重测算出企业层面上游度指数。近年来,国内外部分学者也陆续采用这种测算方法进行相关研究,并得出稳健可靠的结论 [23-25]。另外,本研究考虑到由于资产的专用性,企业往往不具有选择行业(产品)的自由或权利,对于单产品企业或持续经营的企业来说实现产品(行业)转换有一定难度,从而可能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因此后续实证研究将会针对该问题根据单产品与多产品、持续经营年份分样本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

(二) 企业价值链定位测算方法

综上可知,本研究的企业价值链升级可理解为企业所生产产品距离最终消费品长度的增加,即企业更多以前向嵌入的方式融入国内价值链。如能源原材料供给、研发设计等环节更多的作为其他环节的中间投入品,因此更靠近国内价值链上游环节;而加工组装更靠近国内价值链下游环节。为统一价值链定位的上下游与传统“微笑曲线”的上下游,黎峰 [16] 将资源能源供给环节纳入传统“微笑

曲线”的上游环节,形成更适用于价值链分工分析的“改进的微笑曲线”^②。各企业国内价值链分工定位测算参考Chor *et al.* [23]、Ju and Yu [24] 等方法,首先采用2002年122部门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估计行业上游度,行业上游度计算的基本思想是将生产链各生产阶段赋予等长度值,并采用各行业产品投入各生产阶段的产量为权重,计算行业在价值链上位置的加权平均值。具体公式如下:

$$U_i = 1 \times \frac{F_i}{Y_i} + 2 \times \frac{\sum_{j=1}^N d_{ij} F_j}{Y_i} + 3 \times \frac{\sum_{j=1}^N \sum_{k=1}^N d_{ik} d_{kj} F_j}{Y_i} + 4 \times \frac{\sum_{j=1}^N \sum_{k=1}^N \sum_{l=1}^N d_{il} d_{lk} d_{kj} F_j}{Y_i} + \dots \quad (13)$$

其中, Y_i 为总产出, F_i 为用于最终消费的产出, d_{ij} 为行业 j 的1单位产出中行业 i 产出的投入比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进出口数据构造了企业层面的上游度指数。他们认为,每家企业可能生产属于不同行业的多种产品,且企业生产或出口的产品通常具有相似性,因此我们可用企业平均的出口上游度近似代替企业的生产上游度。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Upstreamness = \sum_{i=1}^N U_i E_{ij} / E_j \quad (14)$$

其中, E_{ij} 表示企业 j 在行业 i 的出口额, E_j 为企业出口总额。该指标值越大,表示企业更多地为其他企业提供中间品,越靠近国内价值链上游;反之则表示该企业更多地依赖其他企业提供中间品,越靠近国内价值链下游。

(三) 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2002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分别测算了各行业的上游度情况。结果显示,能源与原材料行业同技术密集型的化学原料制造业均位于价值链上游。可见,价值链定位的上下游与传统“微笑曲线”定位的上下游存在差异,上游度指数更多反映了产业间深度融合的程度^[26]。因此,黎峰^[16]将资源能源供给行业纳入传统“微笑曲线”,糅合两种上下游定位方式,形成一条更适用于价值链分工分析的新式“微笑曲线”,由于本文的后续研究对象主要是制造企业,因此,根据黎峰^[16]提出的“改进的微笑曲线”的前半段,价值链定位越高的企业通常具备较高的附加值率。

为验证黎峰^[16]的观点,本文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计算出2002年各制造行业上游度情况,并搜集各行业相应年份增加值现状,发现行业上游度与增加值呈现高度一致性(见图3)。因此,上游度指标似乎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行业或国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近年来,国内众多学者也陆续借鉴该方法来衡量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认为行业上游度越大,我国的分工地位越高^[27-29]。

四、计量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为研究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间的关系,考察产业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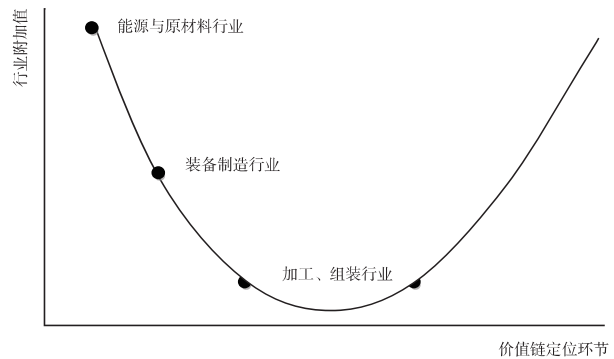


图2 新式微笑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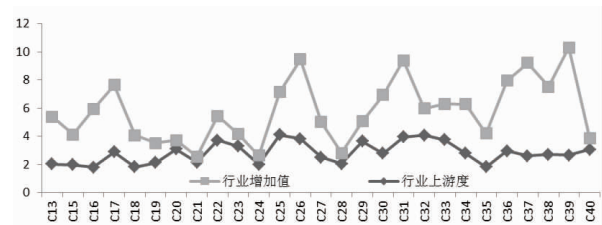


图3 2002年行业上游度与行业增加值

对企业价值链定位的经济效应,并探索有效推进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产业政策实施路径,包括目标行业的选择与产业政策的实施范围等,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Upfirm_{it} = \beta_0 + \beta_1 Tax_{it} + \beta_2 Sub_{it} + \beta_3 Loan_{it} + \beta_4 Competition_{it} + \beta_5 Tax_{it} \times Competition_{it} + \beta_6 Sub_{it} \times Competition_{it} + \beta_7 Loan_{it} \times Competition_{it} + \beta_8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5)$$

$$Upfirm_{it} = \beta_0 + \beta_1 Tax_{it} + \beta_2 Sub_{it} + \beta_3 Loan_{it} + \beta_4 Competition_{it} + \beta_5 Equ_tax_{it} + \beta_6 Equ_sub_{it} + \beta_7 Equ_loan_{it} + \beta_8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6)$$

其中, $Upfirm_{it}$ 为企业层面上游度指数, Tax_{it} 为税收优惠政策, Sub_{it} 为政府补贴政策, $Loan_{it}$ 为低息贷款政策, $Competition_{it}$ 表示市场竞争程度, Equ_tax_{it} 、 Equ_sub_{it} 、 Equ_loan_{it} 为产业政策惠及度变量, $Control_{it}$ 则代表一系列影响企业价值链定位的其他变量, ε_{it} 为随机干扰项。 i 、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二) 变量定义与说明

1. 产业政策(Policy)

本文借鉴 Beason and Weinstein^[30] 的方法,以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政策工具变量近似度量产业政策。具体算法为:(1) 税收优惠(Tax)。首先计算企业实际所得税率(ETR),然后用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减去 ETR 得到企业优惠税率。由于 200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重新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而本文的样本考察期为 2000—2013 年,因此 2000—2007 年的税收优惠 $Tax = 33\% - ETR$,而 2008—2013 年的税收优惠 $Tax = 25\% - ETR$ 。(2) 政府补助(Sub)。根据 Aghion et al.^[17] 的做法,用补贴收入比重,即补贴收入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近似衡量。(3) 低息贷款(Loan)。本文借鉴 Aghion et al.^[17] 的做法,以利息支出与流动负债之比来衡量企业的贷款利率,并将行业的平均贷款利率减去各企业的贷款利率,其差值越大,表明该企业获得的贷款优惠越多。

2. 市场结构(Competition)

市场结构选取勒纳指数来衡量,参考 Peress^[31] 的做法,本文定义勒纳指数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营业收入。勒纳指数越大,代表企业在行业内的定价能力越强,市场集中度越高。由于勒纳指数是对市场竞争度的反向度量,因此我们通过 $1 - Lerner$ 近似衡量市场竞争程度。

3. 产业政策 - 市场竞争交互变量(Policy × Competition)

为考察产业政策对不同竞争性行业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影响的差异性,本文试图构建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的交互项。具体为产业政策变量与市场竞争度的乘积,即: $Tax_{it} \times Competition_{it}$ 、 $Sub_{it} \times Competition_{it}$ 、 $Loan_{it} \times Competition_{it}$ 。

4. 产业政策惠及度

产业政策惠及度即产业政策集中度的反向指标,主要用来刻画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是竞争性的还是集中性的,体现政策扶持额度在企业间的分布是否均匀。具体包括补贴政策竞争兼容度(Equ_sub)、税收政策竞争兼容度(Equ_tax)及贷款政策竞争兼容度(Equ_loan)。首先我们参考产业集中度的度量方法,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度量各政策的集中度,即补贴政策集中度(Herf_subsidy)、税收政策集中度(Herf_tax)和贷款政策集中度(Herf_loan)。集中度越小,说明政策分配越公平。然后再基于集中度指标,构建政策竞争兼容度变量。另外,为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计算集中度指标时剔除各企业自身的政策支持量。产业政策集中度指标的具体测算方法为:

$$Herf_subsidy_{ijt} = \sum_{h \in j, h \neq i} \left(\frac{Subsidy_{ijt}}{Sum_subsidy_{jt}} \right)^2$$

$$Herf_tax_{ijt} = \sum_{h \in j, h \neq i} \left(\frac{Tax_{ijt}}{Sum_tax_{jt}} \right)^2$$

$$Herf_loan_{ijt} = \sum_{h \in j, h \neq i} \left(\frac{Loan_{ijt}}{Sum_loan_{jt}} \right)^2$$

因此,产业政策惠及度指标分别为:

$$Equ_sub_{ij} = 1 - Herf_subsidy_{ij}$$

$$Equ_tax_{ij} = 1 - Herf_tax_{ij}$$

$$Equ_loan_{ij} = 1 - Herf_loan_{ij}$$

5. 其他控制变量

借鉴相关研究,本文控制了企业、地区、行业层面的特征变量。首先根据理论分析结果选取一系列影响企业价值链升级潜质的特征变量,具体包括:企业规模(*Scale*)、资产收益率(*Roa*)、企业固定资产规模(*FA*)、企业年龄(*Age*)、企业出口密度(*Export*)、企业产权结构(*Property*)等。其次,前述理论模型表明,行业竞争是影响企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因素,因此文章拟引入行业市场集中度(*HHI*)指标近似衡量行业竞争度,考察其对企业价值链升级行为的影响。最后,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同样结合理论分析结果选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两项指标。其中制度环境拟借鉴张杰等^[32]提出的兼顾市场一体化进程与市场分割现象两个维度的综合信息因素,即 $Institution = Market(1 - Diseg)$,作为地区制度环境测度总指标,其中 *Market* 表示市场一体化进程,数据采用樊纲等^[33]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提供的分省际的总得分、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及中介组织发育、法律六个方面的市场化进程指数,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按照95%的方差选取标准,得到综合因子得分,作为市场一体化进程的代理变量。*Diseg*表示市场分割,借鉴多数研究成果^[34-35],本文同样采用价格法来测量各省份的市场分割程度,商品价格指数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③。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主要控制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ize处理。

(三)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所用微观企业数据来自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解决该数据库存在的样本错配、指标异常与缺漏、样本选择偏误等问题,我们参考杨汝岱^[36]的研究,在数据匹配的基础上对样本进行了处理,如删除关键指标缺失的样本、剔除职工人数不足8人的企业样本、删除违背会计准则的样本等。另外,测算企业层面价值链定位所需数据来自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两套数据的匹配方法借鉴张杰等^[37]的研究。由于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范围选择的差异,最终匹配成功的企业是直接参与海关进出口报关的国有企业或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通过对不合理样本的删除以及非纯出口企业的剔除,本文最终得到有效样本的365474个观测值。

五、实证分析

(一) 行业间产业政策实施路径

为探究产业政策的正确实施路径,本文借鉴Aghion *et al.*^[17]“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的研究思路,首先对模型(15)进行估计,以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链定位的影响是否与市场竞争度密切相关,其中产业政策工具变量与市场竞争度的交互项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

首先,表1中列(1)、列(4)和列(7)是未考虑市场竞争度时的估计结果,此时税收优惠与低息贷款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政府补贴的估计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可见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扶持并未起到促进企业价值链定位提升的作用。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政策扶持方向与力度通常具有一定的计划经济色彩,存在规范散、变化快、透明度低等一系列问题,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大^[38]。“事前逆向选择”与“事后道德风险”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政策实施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激励作用。列(2)、列(5)与列(8)引入了市场竞争度,其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市场竞争度显著促进了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验证了假说1。列(3)、列(6)与列(9)进一步引入产业政策工具变量与市场竞争度交互项,很显然各交互项估计系数都显著为正,意味着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促进作用依赖企业所在市场的竞争程度,这一结论部分验证了假说2。另外,各模型中制度环境变量的估计系数几乎都通过了10%的显著

性检验,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能有效推进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同样符合我们的预期。上述分析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促进作用依赖企业所在市场的竞争程度,选择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为目标产业,有助于促进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

表 1 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i>Tax</i>	-0.035** (0.014)	-0.042*** (0.014)	0.008 (0.028)						
<i>Sub</i>				0.067 (0.118)	0.050 (0.122)	1.302 (1.164)			
<i>Loan</i>							-0.217*** (0.045)	-0.212*** (0.046)	-0.276*** (0.069)
<i>Competition</i>		0.049** (0.020)	0.080** (0.036)		0.041* (0.022)	0.134*** (0.044)		0.037* (0.020)	0.221*** (0.032)
<i>Tax × Com</i>			0.004** (0.002)						
<i>Sub × Com</i>						0.004* (0.002)			
<i>Loan × Com</i>									0.003** (0.002)
<i>Institution</i>	0.003** (0.001)	0.002* (0.001)	0.003 (0.002)	0.004*** (0.002)	0.004*** (0.002)	0.001 (0.002)	0.002* (0.001)	0.002 (0.001)	0.004** (0.00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251 070	245 410	128 929	211 601	208 747	84 979	251 000	245 285	130 605
R ²	0.079	0.080	0.080	0.088	0.088	0.086	0.080	0.081	0.080

注:该表内容为作者采用 Stata 软件计算的结果。其中,*、**、***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然而,目前政府并未在市场竞争更激烈的城市或行业设定较高的税收优惠、补贴及较低的贷款利息率。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及低息贷款同市场竞争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仅为 0.009 6、-0.000 2 及 0.074,表明各产业政策工具变量与市场竞争度几乎没有关联性。可见,如果政府以维护市场竞争的方式实施产业政策,那么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将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二) 行业内产业政策实施路径

1. 产业政策普惠性与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

为进一步分析产业政策对扶持行业内企业应采取“一视同仁”的方式还是“差别对待”的方式,本文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引入产业政策惠及度变量,即对模型(16)进行估计。表 2 的第 5、6、7 行显示了产业政策惠及度变量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贴、税收优惠政策普及度的提高都能有效推进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表明税收优惠与补贴政策在行业内的资源分配越倾向于公平,则越有利于促进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因此假设 2 得到验证。但贷款政策惠及度变量与企业价值链定位间存在消极但不显著的关系,可见贷款政策在企业间的公平实施并不会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产生显著影响。对此可能的解释为:金融资源价格体现了行业内企业的平均融资能力,而升级能力强的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融资能力,他们对融资政策变动的反应并不敏感,致使融资贷款放开可能会吸引更多融资能力弱的低效率企业,从而导致整体升级效率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2. 行业内企业异质性问题考察

如果产业政策在创新性企业间引发更大竞争时更有效,那么我们的产业政策应该对更有可能参与研发创新的企业提供完全公平的政策配置。Melitz^[39]曾研究指出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往往越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也通常是成本较低、竞争更激烈的企业。另外,还有一种增强市场竞争的方式便是吸引众多新企业或年轻企业进入市场。因此,为强调企业规模与新进企业影响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性,本文基于模型(16),对产业政策惠及度变量进行适当修正,即根据企业规模与企业年龄的倒数

赋予权重重新计算产业政策惠及度变量(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越年轻给予权重越高),并重新估计模型(16),具体估计结果见表2的列(5)与列(6)。

具体来看,针对企业规模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模型5)相较于统一的产业政策惠及度(模型4),其影响效果并未显著增加,表明根据企业规模的不同确定产业政策的差异并不能有效推进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而模型(6)的估计结果显示,根据企业年龄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能更有效地推进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其中税收与补贴政策惠及度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扩大近1.5倍和近7.3倍。可见,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应该针对更加年轻有力的企业而不是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这也是通过吸引新企业或年轻企业进入而增强市场竞争的方式。出现针对年轻企业而不是大公司的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影响更显著的情况,原因可能为:(1)年轻企业较多的行业通常具备较低的进入门槛与较多的潜在进入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能更有效地激发企业的升级动力以获得市场份额;

(2)年轻企业通常了解并掌握了所属行业内较为前沿的技术,并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企业家通常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去树立自身公司的品牌,展现自身的实力,公司整体具有较强的意志力去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与影响力,因此,该类公司对政府扶持政策的普惠性更加敏感,更能激发该类企业的价值链升级意识与行为。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分别设置企业年龄(*Dummy_age*)和企业规模(*Dummy_size*)分组虚拟变量,再次通过纳入产业政策惠及度变量与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进行回归估计。其中,企业年龄分组虚拟变量以全样本的平均经营年限为区分标准,当企业的经营年限小于全样本的平均经营年限时,视为年轻企业,即定义*Dummy_age* = 1,反之为成熟企业,即*Dummy_age* = 0。用同样的方法设置企业规模分组虚拟变量,以全样本的平均经营规模为区分标准,当企业的经营规模大于全样本的平均经营规模时,视为规模以上企业,即定义*Dummy_size* = 1,反之为规模以下企业,即*Dummy_size* = 0。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仅产业政策惠及度变量与企业年龄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产业政策惠及度变量与企业规模分组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回归结论的准确性。

表2 产业政策普惠性与企业价值链升级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i>Tax</i>	-0.052 *** (0.016)	-0.049 *** (0.016)	-0.062 *** (0.019)	-0.059 *** (0.019)	-0.055 *** (0.019)	-0.050 *** (0.018)
<i>Sub</i>	1.882 *** (0.680)	2.081 *** (0.710)	1.832 ** (0.830)	2.148 ** (0.877)	1.917 ** (0.875)	1.735 ** (0.847)
<i>Loan</i>	-0.082 (0.053)	-0.086 * (0.052)	-0.126 ** (0.056)	-0.118 ** (0.057)	-0.131 ** (0.057)	-0.142 ** (0.055)
<i>Competition</i>	0.074 *** (0.024)	0.064 *** (0.024)	0.043 (0.029)	0.046 (0.029)	0.045 (0.029)	0.066 ** (0.028)
<i>Equ_tax</i>	0.061 *** (0.010)			0.098 *** (0.020)		
<i>Equ_sub</i>		0.026 *** (0.009)		0.037 ** (0.018)		
<i>Equ_loan</i>			-0.004 (0.006)	-0.003 (0.006)		
<i>Equ_taxsize</i>					0.064 *** (0.022)	
<i>Equ_subsize</i>					0.058 *** (0.021)	
<i>Equ_loansize</i>					0.020 *** (0.006)	
<i>Equ_taxage</i>						0.244 *** (0.088)
<i>Equ_subage</i>						0.306 * (0.163)
<i>Equ_loanage</i>						-0.009 (0.022)
<i>Institution</i>	0.005 *** (0.002)	0.004 ** (0.002)	0.010 *** (0.002)	0.010 *** (0.002)	0.010 *** (0.002)	0.009 *** (0.00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88 635	192 620	122 901	119 955	121 507	132 042
R ²	0.088	0.089	0.093	0.093	0.092	0.088

注:该表内容为作者采用Stata软件计算的结果。其中,*、**、***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综合分析以上有关产业政策实施的普惠性与企业异质性问题考察可知,产业政策在行业内部的实施方式如果倾向于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将有效激发企业发展动力,促进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

(三) 分组分析

1. 基于企业性质分组的产业政策效应统计分析

按照企业性质,我们整理出各类型产业政策工具与企业上游度情况。根据表 4 的结果可清楚看到,在价值链提升方面表现差的企业往往成为资源分配的赢家。资源与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倾斜力度更大,国有企业所获补贴额甚至近乎非国有企业所获补贴额的 3 倍,然而其价值链定位却远远不及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上游度达到了 3.018 7,而国有企业上游度却只达到 3.006 6。这一现象似乎表明了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国有企业。

基于上述现象,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加转轨”经济体,企业性质是影响产业政策目标导向的关键因素。我们不能忽略产权性质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影响。因此下文将样本按照企业性质进行分组,考察不同性质企业对产业政策与市场结构的反应是否存在差异。

2. 分组实证检验

根据表 5 的回归结果可知,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的互补性仅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才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起推动作用,而对国有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推动作用不明显。这一结论与上述统计分析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受我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国有企业更多地将重心放在实现政治目标与维护政治关系上,缺乏对价值链升级的重视,国有企业在产业政策激励下,更有可能采取“为扶持寻扶持”的发展策略,而非真正致力于提升价值链质量。

(四)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前文的回归分析忽略了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资源禀赋条件限制下,

表 3 基于企业年龄与企业规模的进一步分组检验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i>Tax</i>	-0.055 *** (0.016)	-0.051 *** (0.016)	-0.063 *** (0.019)	-0.054 *** (0.016)	-0.051 *** (0.016)	-0.063 *** (0.019)
<i>Sub</i>	1.862 *** (0.680)	2.047 *** (0.710)	1.819 ** (0.830)	1.896 *** (0.680)	2.087 *** (0.710)	1.834 ** (0.830)
<i>Loan</i>	-0.083 (0.053)	-0.087* (0.052)	-0.128 ** (0.056)	-0.084 (0.053)	-0.087* (0.052)	-0.128 ** (0.056)
<i>Competition</i>	0.074 *** (0.024)	0.064 *** (0.024)	0.043 (0.029)	0.074 *** (0.024)	0.064 *** (0.024)	0.043 (0.029)
<i>Equ_tax</i>	0.043 *** (0.013)			0.058 *** (0.010)		
<i>Equ_sub</i>		0.013 (0.010)			0.032 *** (0.009)	
<i>Equ_loan</i>			-0.018 ** (0.009)			-0.007 (0.007)
<i>Equ_tax × Dummy_age/Equ_tax × Dummy_size</i>	0.036 ** (0.017)			0.019 (0.024)		
<i>Equ_sub × Dummy_age/Equ_sub × Dummy_size</i>		0.065 ** (0.027)			-0.028 (0.018)	
<i>Equ_loan × Dummy_age/Equ_loan × Dummy_size</i>			0.026 ** (0.012)			0.014 (0.014)
<i>Dummy_age/Dummy_size</i>	0.024 *** (0.006)	-0.037 (0.024)	0.014* (0.007)	0.014 ** (0.006)	0.009 (0.007)	0.004 (0.007)
<i>Institution</i>	0.004 *** (0.002)	0.004 ** (0.002)	0.010 *** (0.002)	0.005 *** (0.002)	0.004 ** (0.002)	0.010 *** (0.00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88 635	192 620	122 901	188 635	192 620	122 901
R ²	0.089	0.089	0.093	0.088	0.089	0.093

注:该表内容为作者采用 Stata 软件计算的结果。其中,*、**、***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 4 基于企业性质分组的产业政策

企业性质	企业税收优惠	政府补贴	企业实际贷款率	企业上游度
国有企业	0.228 2	0.006 5	0.048 6	3.006 6
非国有企业	0.162 3	0.002 2	0.051 8	3.018 7

考虑到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实施可能带有政府主观色彩,一方面政策扶持可能倾向于选择升级动力强、投资风险小的企业,从而夸大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激励效应;另一方面政策可能倾向于扶持生产效率低、经营绩效差的弱小企业,从而低估产业政策的作用。为解决上述样本选择性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拟构建两阶段系统广义矩估计(Two-step System-GMM)模型来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以进一步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模型具体估计如下:

$$Upfirm_{it} = \beta_0 + \beta_1 Upfirm_{it-1} + \beta_2 Tax_{it} + \beta_3 Sub_{it} + \beta_4 Loan_{it} + \beta_5 Competition_{it} + \beta_6 Equ_tax_{it} + \beta_7 Equ_sub_{it} + \beta_8 Equ_loan_{it} + \beta_9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7)$$

根据表6第2列显示的两阶段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回归结果可知,在考虑本研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产业政策与市场结构的互补性依然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这与前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证实了产业政策与市场结构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影响。

表5 按照产权性质分样本回归结果

	全样本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i>Tax</i>	-0.059 *** (0.019)	-0.007 (0.127)	-0.082 ** (0.034)
<i>Sub</i>	2.148 ** (0.877)	2.231 (3.872)	1.314 (1.463)
<i>Loan</i>	-0.118 ** (0.057)	0.606 (0.426)	-0.236 ** (0.110)
<i>Competition</i>	0.046 (0.029)	-0.015 (0.170)	0.040 (0.067)
<i>Equ_tax</i>	0.098 *** (0.020)	0.058 (0.152)	0.144 *** (0.035)
<i>Equ_sub</i>	0.037 ** (0.018)	-0.081 (0.085)	0.086 ** (0.038)
<i>Equ_loan</i>	-0.003 (0.006)	0.018 (0.034)	0.001 (0.012)
<i>Institution</i>	0.010 *** (0.002)	0.003 (0.014)	0.008 * (0.004)
Control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19 955	2 740	25 949
R ²	0.093	0.121	0.105

注:该表内容为作者采用Stata软件计算的结果。其中,*、**、***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表6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GMM	企业经营产品数量		企业持续经营年份		
		单产品企业	多产品企业	持续经营5年及以上	持续经营6年及以上	持续经营7年及以上
<i>L. Upfirm</i>	-1.156 *** (0.051)					
<i>Tax</i>	-0.220 (0.508)	-0.010 (0.013)	-0.072 *** (0.022)	-0.075 *** (0.026)	-0.091 *** (0.031)	-0.112 *** (0.038)
<i>Sub</i>	-17.109 (17.367)	0.135 (0.564)	2.864 *** (1.044)	1.040 (1.204)	1.346 (1.420)	2.816 (1.733)
<i>Loan</i>	1.062 * (0.606)	-0.209 *** (0.036)	-0.004 (0.068)	-0.105 (0.083)	-0.099 (0.098)	-0.084 (0.119)
<i>Competition</i>	-0.169 (0.116)	0.096 *** (0.019)	0.001 (0.035)	-0.016 (0.043)	0.011 (0.051)	-0.015 (0.062)
<i>Equ_tax</i>	0.317 *** (0.058)	0.079 *** (0.013)	0.078 *** (0.023)	0.096 *** (0.025)	0.087 *** (0.029)	0.063 * (0.034)
<i>Equ_sub</i>	0.131 * (0.079)	0.038 *** (0.010)	0.059 *** (0.022)	0.076 *** (0.026)	0.098 *** (0.030)	0.095 *** (0.036)
<i>Equ_loan</i>	-0.072 *** (0.018)	0.017 *** (0.004)	-0.013 * (0.007)	0.006 (0.008)	0.010 (0.010)	0.003 (0.012)
<i>Institution</i>	0.058 *** (0.016)	0.004 *** (0.001)	0.014 *** (0.002)	0.011 *** (0.003)	0.013 *** (0.003)	0.012 *** (0.00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2)	-1.00 (0.316)					
Sargan	0.319					
样本量	28 268	20 721	99 234	59 581	43 941	30 097
F/R ²	184.50	0.383	0.102	0.102	0.104	0.109

注:该表内容为作者采用Stata软件计算的结果。其中,*、**、***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

2. 考虑企业经营产品数量及持续经营时间后对结果产生的影响

考虑到资产的专用性,资产要素在不同行业(产品)间的再配置必然涉及一定的费用而产生成

本,因此企业往往不具有选择行业(产品)的自由或权利。因此对于单产品企业或持续经营的企业来说,本研究通过将行业(产品)层面上游度水平加权平均到企业层面的上游度,得出的相关结论很可能不再成立。因此本文通过区分单产品/多产品企业、持续经营时间长短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已有研究结论是否在不同样本中存在差异。根据表6的结果显示可知,各分组样本的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进一步验证了产业政策与市场结构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影响的稳健型。

六、结论与启示

如何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更好地实现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是本文回答的主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纳入税收/补贴机制的Bertrand模型,推导出以竞争兼容方式实施的税收/补贴政策能有效提高企业价值链升级概率的理论机制。实证部分则基于2000—2013年微观企业面板数据,考察了产业政策与市场结构的互补性与兼容性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策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协同更能有效地推动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政府产业政策实施目标应针对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2)行业内部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应倾向于维护或增强市场竞争。一方面注重普惠性,针对整个行业而不是单个企业或部分企业的产业政策,有助于吸引众多潜在企业进入,从而有效增加市场竞争力度,激发企业价值链升级行为;另一方面,产业政策针对发展动力强的年轻企业时,能更大程度提升市场竞争力度,进而对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激发效应更大。(3)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的互补性对非国有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的推动作用更有效。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

(一) 目标行业的选择需重视政策与市场化的共生互补性

研究表明市场竞争度的提高不仅能显著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而且能提高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扶持效应。因此,政府一方面应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建立与完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与体系,让市场回归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应适当调整当前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既要重视“有效市场”也要强调“有为政府”,注重结合市场机制挑选出具有较强竞争力、良性发展前景与经营绩效的企业进行扶持,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强化政府“看得见的手”在推动企业价值链升级中的积极作用。

(二) 重视产业政策实施的“普惠性”

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惠及度的增加能显著推进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因此政府应通过更广泛、更均质的产业政策,吸引各行业内更多潜在企业进入,增强企业间的产品与技术竞争,选出国家的“战略性行业”、行业的“胜利者”,也就是说政府的政策实施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避免人为地选定“赢家”,应通过竞争友好型产业政策的实施挑选出“黑马”。另外,产业政策的普惠性原则应考虑到企业异质性问题。研究表明,根据企业年龄来确定产业政策惠及度的差异能显著推进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因此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应该针对更加年轻有力、成长潜力较强的企业而不是具有规模经济的企业,通过吸引新企业或年轻企业的进入增强市场竞争。虽然年轻企业对研发创新、转型升级具有较高意愿,但受制于资金、人才、市场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大量中小年轻企业陷入想升级没资金、想发展没把握的困境。因此政府及有关部门应从补贴、税收、政府采购、金融、技术服务、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如对年轻创新型企业给予税收补贴,设立年轻企业发展专项基金与产业投资基金,引导包括金融机构、民营资本、国外资本在内的多渠道资金支持年轻企业的发展,加强对企业发明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等无形资产的保护力度,为年轻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等。

(三) 针对企业异质性问题的产业政策

根据分组回归结果可知,政策与市场的互补性仅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才能有效发挥对价值链升级的推动作用。因此,政府一方面应积极调整偏向大型国有企业的现代产业政策体系,除对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国有企业给予一定支持以维持中坚力量外,应逐渐降低产业政策对其他大型国

有企业的扶持和保护力度,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企业向附加值高端环节攀升;其次,政府应逐渐减少非国有企业在金融、财政体制、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限制,为非国有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有力激发非国有企业价值链升级行为。

注释:

- ①据 Lerner 的研究,专利诉讼的直接成本占全部研发支出的比例已经超过 25%。
 ②根据黎峰^[16]的观点,改进后微笑曲线的上游环节包括:资源能源供给、研发设计、品牌及营销等。
 ③商品价格指数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公布的各省商品环比价格指数。限于篇幅,文中没有给出市场分割程度的测算方法。

参考文献:

- [1]尹伟华.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分解与失衡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6(3):21-27.
 [2]霍伟东,周荃,宋易珈.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贸易政策的战略转移[J].亚太经济,2018(5):49-56+64+150.
 [3]马治国.新时代如何更好完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的观察与思考[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17):6-17.
 [4]HUMPHREY J,SCHMITZ H.Chain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taking a stock [A]//SCHMITZ H.Local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ssues of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Cheltenham: Elgar,2004: 349-381.
 [5]AMSDEN A H, CHU W W. Beyond late development: Taiwan's upgrading policie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3.
 [6]SCHMITZ H. Local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4(21): 1-8.
 [7]徐泓.日本战后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评析[J].宏观经济管理,2003(10):52-54.
 [8]徐孝新.美国统一市场建设实践及启示[J].当代经济管理,2016(11):5-10.
 [9]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59-68.
 [10]刘志彪,郑江淮.价值链上的中国:长三角选择性开放新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1]王燕飞.国家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测度与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8):21-38.
 [12]徐宁,皮建才,刘志彪.全球价值链还是国内价值链——中国代工企业的链条选择机制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1):62-74.
 [13]黎峰.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国家价值链分工——基于改进的区域投入产出模型[J].中国工业经济,2016(3):52-67.
 [14]张少军.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新方法[J].国际贸易问题,2009(4):108-113.
 [15]张少军,刘志彪.国内价值链是否对接了全球价值链——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3(2):14-27.
 [16]黎峰.中国国内价值链是怎样形成的? [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9):76-94.
 [17]AGHION P, CAI J, DEWATRIPONT M, et al. 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2015,7(4):1-32.
 [18]ANTRAS P, CHOR D, FALLY T, et al. 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02(3):412-416.
 [19]FALLY T. On the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US [R]. Mimeo, 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2011.
 [20]HAUSMANN R, HWANG J,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7,12(1):1-25.
 [21]何继新,刘莹.不完全合作、非合作博弈的逻辑:企业与行业协会价格串谋行为分析[J].经济经纬,2008(1):73-75.
 [22]LOS B, TIMMER M, DE VRIES G. How global are global value chains? A new approach to measure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5,55(1):66-92.
 [23]CHOR D, MANOVA K, YU Z. The global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 of Chinese firms [R]. Mimeo, Standard University,2014.
 [24]JU J D, YU X D. Productivity, profitability, production and export structures along the value chain in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5,43(1):33-54.

- [25] 沈鸿, 顾乃华. 地方财政分权、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行为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7(9): 25-36.
- [26] 程大中.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产出分析 [J]. 经济研究, 2015(9): 4-16.
- [27] 鞠建东, 余心玓. 全球价值链上的中国角色——基于中国行业上游度和海关数据的研究 [J]. 南开经济研究, 2014(3): 39-52.
- [28] 王永进, 刘灿雷.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基于制造业数据的微观考察 [J]. 管理世界, 2016(6): 10-21.
- [29] 刘辉煌, 吕雪丽. 国内价值链分工质量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改进的行业上游度分析 [J]. 商业研究, 2018(7): 125-132.
- [30] BEASON R, WEINSTEIN D E. Growth,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argeting in Japan (1955—1990) [J]. 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 1996, 78(2): 286-295.
- [31] PERESS J.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insider trading, and stock market efficiency [J]. Journal of finance, 2010, 65(1): 1-43.
- [32] 张杰, 李勇, 刘志彪. 制度对中国地区间出口差异的影响: 来自中国省际层面 4 分位行业的经验证据 [J]. 世界经济, 2010(2): 83-103.
- [33]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 [34] 陆铭, 陈钊. 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 [J]. 经济研究, 2009(3): 42-52.
- [35] 宋渊洋, 黄礼伟. 为什么中国企业难以国内跨地区经营? [J]. 管理世界, 2014(12): 115-133.
- [36] 杨汝岱. 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J]. 经济研究, 2015(2): 61-74.
- [37] 张杰, 陈志远, 刘元春. 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 [J]. 经济研究, 2013(10): 124-137.
- [38] 李骏, 刘洪伟, 万君宝. 产业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竞争性与公平性视角 [J]. 产业经济研究, 2017(4): 115-126.
- [39]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1725.

(责任编辑: 李 敏)

Industrial policy, market structure and positioning of the enterprise value chain

TANG Rong, GU Naihua, TAN Zhouling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Whether industrial policy effectively promotes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a key empiric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industrial economic practice. The paper draws on the latest method proposed by Antras et al. and combines micro-enterprise database to measure the enterprise value chain positio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f the value chain, and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policy,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positioning of enterprise value cha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industry level,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focus on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electing industry with high market competition as the target industr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positioning upgrading of the enterprise value chain. Within the industry,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emphasize the promotion of market competition. On one hand, industrial policy should adhere to inclusiveness principle. Industry policy that targets the entire industry rather than individual enterprise or part of enterprises can effectively accommodate market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stimulate the upgrading of the enterprise value chain. On the other h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enterprises”. Industrial policy implemented on “young enterprises” with high market competition and strong innovation power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upgrading of enterprise value chain.

Key words: industrial policy; market structure; positioning of enterprise value chain; implementation path; young enterprise